

谢林著作集

先刚 主编

启示哲学导论

Einleitung in die Philosophie der Offenbarung



[德] 谢林 著 王丁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谢林著作集

先刚 主编

启示哲学导论

Einleitung in die Philosophie der Offenbarung

〔德〕谢林 著 王丁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启示哲学导论 / (德) 谢林著; 王丁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9.4

ISBN 978-7-301-30219-4

I. ①启… II. ①谢… ②王… III. ①谢林 (Schelling, 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von 1775-1854) — 哲学思想 IV. ① B516.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01238 号

- | | |
|-------|---|
| 书 名 | 启示哲学导论
QISHI ZHEXUE DAOLUN |
| 著作责任者 | (德) 谢 林 著 王 丁 译 |
| 责任编辑 | 王晨玉 |
| 标准书号 | ISBN 978-7-301-30219-4 |
| 出版发行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 地 址 |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
| 网 址 |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 电子信箱 | pkuwsz@126.com |
| 电 话 | 邮购部 010-62752015 发行部 010-62750672 编辑部 010-62757065 |
| 印 刷 者 |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
| 经 销 者 | 新华书店 |
| | 890 毫米 × 1240 毫米 16 开本 18.75 印张 198 千字 |
| | 2019 年 4 月第 1 版 201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
| 定 价 | 78.00 元 |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部联系, 电话: 010-62756370

中文版“谢林著作集”说明

如果从谢林于 1794 年发表第一部哲学著作《一般哲学的形式的可能性》算起,直至其 1854 年在写作《纯粹唯理论哲学述要》时去世为止,他的紧张曲折的哲学思考和创作毫无间断地整整延续了 60 年的时间,这在整个哲学史里面都是一个罕见的情形。^①按照人们通常的理解,在德国古典哲学的整个“神圣家族”(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里面,谢林起着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诚然,这个评价在某种程度上正确地评估了谢林在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过程中的功绩和定位,但另一方面,它也暗含着贬低性的判断,即认为谢林哲学尚未达到它应有的完满性,因此仅仅是黑格尔哲学的一种铺垫和准备。这个判断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即在黑格尔逐渐登上哲学顶峰的过程中,谢林的哲学思考始终都与他处于齐头并进的状态,而且在黑格尔于 1831 年去世之后继续发展了二十多年。一直以来,虽然爱德华·冯·哈特曼(Eduard von Hartmann)和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等哲学家都曾经对“从

^① 详参先刚:《永恒与时间——谢林哲学研究》,第 1 章“谢林的哲学生涯”,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年,第 4—43 页。

2 启示哲学导论

康德到黑格尔”这个近乎僵化的思维模式提出过质疑,但真正在这个领域里面给人们带来颠覆性认识的,乃是瓦尔特·舒尔茨(Walter Schulz)于1955年发表的里程碑式的巨著《德国唯心主义在谢林后期哲学中的终结》^①。从此以后,学界对于谢林的关注度和研究深度整整提高了一个档次,越来越多的学者都趋向于这样一个认识,即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谢林才是德国古典哲学或德国唯心主义的完成者和终结者。^②

我们在这里无意对谢林和黑格尔这两位伟大的哲学家的历史地位妄加评判。因为我们深信,公正的评价必须而且只能立足于人们对于谢林哲学和黑格尔哲学乃至整个德国古典哲学全面而深入的认识。为此我们首先必须全面而深入地研究德国古典哲学的全部经典著作。进而言之,对于研究德国古典哲学的学者来说,无论他的重心是放在四大家里面的哪一位身上,如果他对于另外几位没有足够的了解,那么很难说他的研究能够获得多少准确而透彻的认识。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中国学界来说,谢林著作的译介尤其是一项亟待补强的工作,因为无论对于康德、黑格尔还是对于费希特而言,我们都已经拥有其相对完备的中译著作,而相比之下,

① Walter Schulz, *Die Vollendung des deutschen Idealismus in der Spätphilosophie Schellings*. Stuttgart, 1955; zweite Auflage, Pfullingen, 1975.

② 作为例子,我们在这里仅仅列出如下几部著作:Axel Hutter, *Geschichtliche Vernunft: Die Weiterführung der Kantischen Vernunftkritik in der Spätphilosophie Schellings*. Frankfurt am Main 1996; Christian Iber, *Subjektivität, Vernunft und ihre Kritik. Prager Vorlesungen über den Deutschen Idealismus*. Frankfurt am Main 1999; Walter Jaeschke und Andreas Arndt, *Die Klassische Deutsche Philosophie nach Kant: Systeme der reinen Vernunft und ihre Kritik (1785-1845)*. München, 2012.

谢林著作的中译仍然处于非常匮乏的局面。有鉴于此,我们提出了中文版“谢林著作集”的翻译出版规划,希望以此推进我国学界对于谢林哲学乃至整个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工作。

中文版“谢林著作集”所依据的德文底本是谢林去世之后不久,由他的儿子(K. F. A. Schelling)编辑整理,并由科塔出版社出版的十四卷本《谢林全集》(以下简称为“经典版”)^①。“经典版”《谢林全集》分为两个部分,第二部分(第11—14卷)首先出版,其内容是晚年谢林关于“神话哲学”和“天启哲学”的授课手稿,第一部分(第1—10卷)的内容则是谢林生前发表的全部著作及后期的一些手稿。自从这套全集出版以来,它一直都是谢林研究最为倚重的一个经典版本,目前学界在引用谢林原文的时候所遵循的规则也是以这套全集为准,比如“VI, 60”就是指所引文字出自“经典版”《谢林全集》第六卷第60页。20世纪上半叶,曼弗雷德·施罗特(Manfred Schröter)为纪念谢林去世100周年,重新整理出版了“百周年纪念版”《谢林全集》^②。但从内容上来看,“百周年纪念版”完全是“经典版”的原版影印,只不过在篇章的编排顺序方面进行了重新调整而已,而且“百周年纪念版”的每一页都标注了“经典版”的对应页码。就此而言,无论人们是使用“百周年纪念版”还是继续使用“经典版”,本质上都没有任何差别。唯一需要指出的是,“百周年纪念版”相比“经典版”还是增加了新的一卷,即所谓的《遗

① F. W. J. Schelling, *Sämtliche Werke*. Hrsg. von K. F. A. Schelling. Stuttgart und Augsburg: Cotta'sche Buchhandlung, 1856-1861.

② *Schellings Werke. Münchner Jubiläumsdruck, nach der Originalausgabe (1856-1861) in neuer Anordnung*. Hrsg. von Manfred Schröter. München 1927-1954.

著卷》(Nachlaßband)^①,其中收录了谢林的《世界时代》1811年排印稿和1813年排印稿,以及另外一些相关的手稿片断。1985年,曼弗雷德·弗兰克(Manfred Frank)又编辑出版了一套六卷本《谢林选集》^②,其选取的内容仍然是“经典版”的原版影印。这套《谢林选集》因为价格实惠,而且基本上把谢林的最重要的著作都收录其中,所以广受欢迎。虽然自1976年起,德国巴伐利亚科学院启动了四十卷本“历史—考据版”《谢林全集》^③的编辑工作,但由于这项工作的进展非常缓慢(目前仅仅出版了谢林1801年之前的著作),而且其重心是放在版本考据等方面,所以对于严格意义上的哲学研究来说暂时没有很大的影响。总的说来,“经典版”《谢林全集》直到今天都仍然是谢林著作的最权威和最重要的版本,在谢林研究中占据着不可取代的地位,因此我们把它当作中文版“谢林著作集”的底本,这是一个稳妥可靠的做法。

目前我国学界已经有许多“全集”翻译项目,相比这些项目,我们的中文版“谢林著作集”的主要宗旨不是在于追求大而全,而是希望在基本覆盖谢林的各个时期的著述的前提下,挑选其中最重要的和最具有代表性的著作,陆续翻译出版,力争成为一套较完备

① F. W. J. Schelling, *Die Weltalter. Fragmente. In den Urfassungen von 1811 und 1813*. Hrsg. von Manfred Schröter. München: Biederstein Verlag und Leibniz Verlag 1946.

② F. W. J. Schelling, *Ausgewählte Schriften in 6 Bänden*. Hrsg. von Manfred Frank.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85.

③ F. W. J. Schelling, *Historisch-kritische Ausgabe*. Im Auftrag der Schelling-Kommission der Bayer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herausgegeben von Jörg Jantzen, Thomas Buchheim, Jochem Hennigfeld, Wilhelm G. Jacobs und Siegbert Peetz. Stuttgart-Band Cannstatt: Frommann-Holzboog, 1976 ff.

的精品集。从我们的现有规划来看,中文版“谢林著作集”也已经有二十卷的规模,而如果这项工作进展顺利的话,我们还会在这个基础上陆续推出更多的卷册(尤其是最近几十年来整理出版的晚年谢林的各种手稿)。也就是说,中文版“谢林著作集”将是一项长期开放性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希望得到学界同仁的更多支持。

本丛书得到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谢林著作集》的翻译与研究”(项目批准号 15JJD720002)的资助,在此表示感谢。

先 刚

2016年1月于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

译者序

本卷中译本,除了收入 1842—1843 年的《启示哲学导论或对肯定哲学的奠基》以下简称《启示哲学导论》以外,还加入了另外三个文本,即 1839 年的《对肯定哲学本原的另一种演绎》,1841 年的《柏林首讲》和 1850 年的《论永恒真理的源泉》,这四个文本共同构成了一个进入“启示哲学”,或者说谢林晚期哲学的“大导论”^①。1841 年,谢林从慕尼黑赴柏林接替黑格尔去世后空下来的教职,这既有政治上的原因,也有思想上的原因^②。在柏林的登台首讲中,已经 65 岁高龄的谢林表示,自己很清楚自己为什么站在这里,也完全明白自己要面对的是怎样一个错综复杂的局面,但也绝不会去逃避自己的使命和天职。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演讲里,谢林明确地把自己在 40 年前,也就是 1801 年首次阐述的“同一哲学”看作是“为哲学史

① 当然,除了本卷中的这些文本以外,能够充作谢林“晚期哲学”导论的还有 1827—1828 年的《世界时代体系》(Siegbert Peetz 编,美茵法兰克福,1998 年),1830 年的《哲学导论》(Walter E. Ehrhardt 编,斯图加特,1989 年)。

② 关于谢林赴柏林的前因后果以及当时的一些外部情况,读者可参见:先刚:《永恒与时间》,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年,第 33 页及以下;古留加:《谢林传》,贾泽林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年,第八章。

2 启示哲学导论

成功书写的新的一页”,而自己现在“要翻过这一页,写下新的一页”(XIV, 359),因此,对于“同一哲学”,无论怎样重视都是不为过的,如果没有它,谢林晚期的哲学根本是不可能的。尽管谢林以其阐述方式的变化多端被称为哲学的“普罗透斯”(Proteus),甚至黑格尔也说,“(谢林的)每一部著作总是重新开始(从来没有一个贯彻到底的完整全体),以前写的著作总是不能令他满意,所以他不得不以不同的形式和术语另起炉灶”^①。但在海德格尔看来,这并不是谢林的缺点,反而是在表明“鲜有思想家像谢林这样从一出道开始就如此富有激情地为自己那个唯一的立场而斗争”,谢林的作品尽管“常常缺少定稿所具有的稳靠性,但所有这些跟那种不断转换立场的致命的机灵并没有任何共通之处”^②。海德格尔的这一判断,跟谢林在这场登台首讲中,说明自己为何在“世界时代”时期(1810—1827)^③陷入了“长期沉默”是一致的,谢林表示,自己只是在“静静地让一种把人类意识拓展到其当下界限之上的哲学对自己进行道说,满足对它最热切的希望,并为之提供被迫切要求的真正开解”(XIV, 360)。如今,在“世界时代”时期的各个手稿和残篇不断得到重新编订和出版之后,谢林的这番话已经得到了无可置疑的证实,正如谢林自道地那样:“如果有人曾多次误入歧途,那么他也敢于多次冒险;如果他曾迷失目标,那他所追求的乃是唯一的道路,是先行者没有为他

①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四卷)》,贺麟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342页。

② 海德格尔:《谢林:论人类自由的本质》,王丁、李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11页。

③ 尽管1821年谢林在埃尔朗根大学开设的课程“全部哲学的本原”(initia philosophiae universae)并没有被冠以“世界时代”之名,但就其内容和论题而言,仍然属于“世界时代”时期。

锁闭的道路。”(XIV, 365)因此,既然我们已经对海德格尔的那句“道路,而非著作”耳熟能详,那么对于谢林,也该抱以同样的理解,我们或许已经习惯了德国唯心论总是以“自成一体”的系统性作品的外貌呈现,是一条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的“直线进路”,但随着汉译谢林著作的不断推进,汉语世界也该慢慢学会去接受,德国唯心论是一张错综复杂的“网”,在这里,围绕着许多共同的根本论题,各个思想家以其独有的道路交织在一起,又沿着自己的道路走向更远的地方。诚然,自1809年的《对人类自由的本质及其相关对象的哲学探究》之后,谢林就没有公开发表过任何成体系的著作,所以谢林晚期的著作经常都是以“编纂性”,而非“系统性”的方式出现的,这固然为读者和研究者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但其好处也是明显的:在各个时期的基本论题已经得到清晰界定的情况下,谢林所呈现出来的通向一个既定目标的“道路”是复数的,他对同一个论题进行的不同方式的阐述为我们更为稳靠地把握他思想的实情提供了多重支点,因而也聚集了更多的思想资源。在这一点上,后世的海德格尔或可与之比肩。在1841年的这篇登台首讲里,谢林的语言沉郁激昂、质朴感人,已然暮年的思想家仍然保持着“对真理与自由孜孜以求的精神”(XIV, 367),表达着对祖国、时代和生命的关切,并显示出对自己的使命和对哲学事业本身的坚毅无惧。因此,这篇演讲足以奠定谢林晚期哲学的“基本情调”(Grundstimmung),故而应该首先来读。

尽管在时间上,《对肯定哲学本原的另一种演绎》(1839)要早于本卷中的《启示哲学导论》(1842—1843),但在论题和内容上,“演绎”最好放在“导论”之后来读,而之所以如此,需要首先对《启示

4 启示哲学导论

哲学导论》的文本和内容做一番简要说明。关于这个文本,应该明确的一点是,谢林之子在编纂其父遗稿时错把柏林时期的《启示哲学导论》编在1841—1842年,实际上这部分是在1842—1843年讲授的,并且文本内容的开始形成不会晚于1837年^①,因此尽管本卷中的《启示哲学导论》是根据谢林之子所编的“全集版”译出,但在年份上做了相应修正。谢林自己的话也佐证了这一点,比如在第二讲中他提到“在我们的课程期间最好就跟上个冬天一样”(XIII, 29),如果按谢林之子所言,这部“导论”是放在1841—1842年和1844—1845年两次讲授“启示哲学”之前来讲的(XIII, VIII),那1841年11月才到柏林的谢林不可能对听众说“上个冬天”。此外,既然谢林自己也强调“这次上课”不管是在“方法上”(XIII, 17)还是在“起点上”(XIII, 33)都不同于上次,那么很明显,这绝不是谢林第一次在柏林上这门课。对比1841—1842年的“保卢斯版启示哲学”^②可以发现,“全集版”中的“启示哲学”讲授方式确实与之有很大的出入。实际上,本卷中的《启示哲学导论》和《对肯定哲学本原的另一种演绎》的内容,在“保卢斯版”里是处在连续的授课过程中的,但“全集版”的好处就在于,把这两个文本分开能使对问题的阐述更加清晰。此外,谢林一生好作导论,“启示哲学”的正文从慕尼黑时期开始就已经比较稳定了,但谢林一直在尝试为它做新的导

① F. W. J. Schelling, *Grundlegung der positiven Philosophie*, hrsg. von Horst Fuhrmans, Torino, Bottega D'Erasmus, 1972, S. 36.

② F. W. J. Schelling, *Philosophie der Offenbarung 1841/42*, hrsg. von Manfred Frank,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77. 当然,“保卢斯版启示哲学”并不是一个严谨的说法,它是由保卢斯“盗印”的谢林1841—1842年“启示哲学”讲座的笔记。

论,本卷中“全集版”的“启示哲学导论”是他为“启示哲学”做的最后一个版本的导论^①,因此有着极高的清晰度和简明性。尽管要把握谢林晚期整个思想道路的细节,仍然需要其他版本“导论”的补充,但对于了解他晚期思想的基本旨趣和大体内容来说,本卷中的“导论”加上已经译出的谢林慕尼黑时期的“近代哲学史”^②,足以给出一个初步的基础。虽然对“导论”的内容在此进行一番“简要复述”既无可能也无必要,但就一些根本问题稍做提示仍是有益的。

谢林晚期哲学是以讲座的形式呈现的,而讲座的标题基本上不是“神话哲学”就是“启示哲学”,这就造成了一些望文生义的误解,比如谢林在晚年成了一个“神秘主义者”,“遁入了基督教神学的玄思中”等等,但就思想的实情来说,谢林的晚期哲学的基本结构首先是对“哲学本身”的“二重化区分”,也就是把哲学分为作为“纯粹唯理论科学”或者“先天—理性科学”的“否定哲学”和作为“自由哲学”或“后天哲学”的“肯定哲学”,而“神话哲学”和“启示哲学”则是对“肯定哲学”的“证成”或者“运用”。这一划分是谢林最终的哲学方案,也是德国唯心论的另一种完结形态,更是谢林对整个形而上学传统,尤其是对从笛卡尔到黑格尔整个近代哲学传统的一种诊断性克服。这种克服的要求出自谢林晚期哲学的基本关切和让他感到“最绝望”的问题:“究竟为什么有某物存在?为什么无不存在?”(XIII, 7)而引发这个问题的,正是近代哲学的主体性自由

① F. W. J. Schelling, *Grundlegung der positiven Philosophie*, hrsg. von Horst Fuhrmans, Torino, Bottega D'Erasmus, 1972, S. 44.

② 谢林:《近代哲学史》,先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

概念及其带来的虚无主义阴影。很明显,这个问题所问的,并不是某个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存在始基或主体,而是在问存在的意义和目的(详见《启示哲学导论》第一讲)。因此可以说,谢林晚期哲学同时也是一种对近代哲学虚无主义后果的诊断和克服。

其次,谢林晚期思想跟“神秘主义”没有任何关系,相反,为了避免这一误解,谢林不仅批判了波墨、雅各比这样的神秘主义者,而且也对自己在“世界时代”时期的“神智学”(Theosophie)阐述方式进行了一番透彻反思(见“导论”第七讲)。同样,谢林晚期思想也不是“基督教哲学”,更没有以某种神秘的“启示”为权威,谢林明确地讲:“哲学现在能以自己的眼睛去看这些(启示宗教的)对象,因为它尊重一切真理,也包括启示的真理,唯有这些真理已被哲学转化为独立且自身已得到认识的真理,在这个程度上,哲学才是哲学。”(XIII, 138)也就是说,谢林要做的是在一种“更高的历史关联中”把握“启示(基督教)”和作为其前提的“神话(异教)”,而不是像黑格尔那样只把它们看作真理的表象(XIII, 145)。这种立足于“更高的历史关联”的考察并不是要把哲学还原为“历史哲学”,也不是要像黑格尔那样把历史理解为理性自身的历史,进而导致一种泛理性主义,而是要借由“否定哲学”与“肯定哲学”的区分,对整个近代理性进行一种批判式的范围划定,考察它的历史性处境和效用,进而重新为其赋予真正意义上的合法性。谢林晚期思想根本上来说是在与黑格尔的争辩中形成的^①,甚至必须放在与黑格尔

① F. W. J. Schelling, *Grundlegung der positiven Philosophie*, hrsg. von Horst Fuhrmans, Torino, Bottega D'Erasmus, 1972, S. 18.

的争辩中来理解^①,可以说通过这一争辩,康德的“理性批判”才在德国唯心论的最后阶段被谢林完成。因此,谢林这个最后版本的“启示哲学导论”要“直接从康德出发”(XIII, 33)也就绝非偶然,要理解谢林的这一最终方案,从康德对存在论证明的批判来切入在一定程度上是颇为有益的。

就存在论证明批判而言,谢林一方面继承了康德的结论,也就是不能直接从神的概念中得出其实存,另一方面也认为“康德并没有切中要害……他根本就没有发现所谓的存在论证明中真正意义上的推论错误”(XIII, 45)。实际上,谢林和康德对存在论证明的批判背景是不同的。如果说康德面对的是沃尔夫主义传统和近代唯理论,进而通过对存在论证明的批判把“神”限定为一个“范导性理念”,而非直接的知识对象,那么谢林面对的则是康德以及紧随其后的整个德国唯心论,尤其是黑格尔哲学。就第一点而言,谢林认为“在康德对理性神学的批判中,肯定性的结论比否定性的更加重要。肯定性的地方就在于,神乃是最终且最高的理性理念并非偶然的而是必然的内容”(ebd)。具体来说就是,在《纯粹理性批判》(B600-B606)中,康德讨论了某个存在者得以被谓述的可能性,即某物被谓述的前提是要有一个在先“谓词总体”或者“可能性总体”,因为它作为总体不能再被谓述,所以它是一个“单一的对象”,因而也就是理性的理念,即“最高存在者”,如果把它“实体化”或者“人格化”,它就被看成了“神”(B612)。这一方面说明,“神”作为“最高

^① Walter Schulz, *Die Vollendung des Deutschen Idealismus in der Spätphilosophie Schellings*, Stuttgart, Neske, 1986, S.313.

存在者”的理念是理性的必然结论,而另一方面,康德也禁止把这个理念看作是“实存的”。对此,康德区分了“存在”的两重含义,即“断定”和“谓述”(B627)。“断定”是对某个东西存在的直接肯定,而“谓述”则是在理性中扩大概念的范围。可以看出,“最高存在者”这个理念是理性通过矛盾律以逻辑的方式构造出来的,在这一过程中,“存在”或者“是”的意义并没有延展到其逻辑含义之外。对此,谢林才有理由说:“神恰只不过是最高的理性理念,进而恰由此也始终必须保持为终点,它绝不可能成为开端。”(XIII, 46)因为“成为开端”就意味着“成为一个过程的开创者”,这个时候,这个理念由以获得的方式和有效性范围,即谓述性的理性就要越出自身之外,设定一个理性之外的存在了。而谢林正是在这一点上展开对黑格尔的批判的。

在谢林看来,黑格尔在“逻辑学”最后,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即混淆了思辨性的一谓述性的“是”,和断定性的“存在”。在黑格尔那里,存在者整体在逻辑学中得到了概念上的完成,这个时候黑格尔的难题就是,逻辑整体如何成为现实整体?对此黑格尔运用了“堕落”“外化”“决断”这样的字眼,但在谢林看来,这已经脱离了“逻辑学”的有效范围,在得到了完成的理念中,“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推动它……再次降格为单纯的存在”,黑格尔的理念“仅仅作为一个无所不包的东西……本身不可能是开端”^①。而能够言说开端的哲学,正是谢林所谓的“肯定哲学”,与之相应,因为理性科学只能以思辨—谓述的方式达到神的理念,并不能使之成为现实的开端,所

① 谢林:《近代哲学史》,先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58、187页。

以就被谢林刻画为“否定哲学”。

因此,“否定哲学”中“否定”一词拥有以下三重含义:第一是开端上的否定,也就是说,既然“否定哲学”的终点是“最高存在者”,那么它作为理性在自身中演进的科学,其开端当然就是“最低的存在者”,谢林将之称为“能够存在者”(das sein Könnende),或者“非一存在者”(nicht-Seiende)(XIII, 64)。其次是方法上的否定,即理性通过自否定的思辨方式从这个开端出发,最终达到“如其所是的存在者”,也就是“与自身等同的存在者”,也就是说,理性的运作方式是“从它之中把不是存在者自身的东西排除出去”(SW, 70),进而也就得出了结论的否定性。也就是说,因为整个过程是以否定辩证法的方式从“非一存在者”出发的,那么它的最终结果其实只是“非一非一存在者”(ebd)。而在谢林看来,这个“非一非一存在者”(das nicht nicht-Seiende)只是一个“概念”,也就是理性科学以否定性的方式,从自己那方面能把握到的“存在者自身”,或者也可以说,如果理性科学的运作方式是通过否定性的辩证法,在 $A \neq -A$, 进而 $A = --A$ 这个基本思辨模式下得到 $A=A$, 那么这个最终的“存在者自身”只是一个经过了中介的,而非直接从自身出发的东西,因而还不是“真正的存在者自身”,但谢林强调,自己的立场就是“存在者自身,所有其他的只不过是纯然表面上的存在者”(XIII, 71)。或者用康德话也可以说,否定哲学的终点是“最高的存在者”这个理念,即“可能性的总体”,它是谓述性的“是”所能展开的极点,但这种意义上的“是”无论如何都不是作为“断定”的“存在”,因此可以看到,谢林的黑格尔批判实际上重复了康德在对存在论证中区